

河南籍噶瑪蘭廳通判閻炘事略

陳進傳*



* 陳進傳 嶺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一、前言

近年來，臺灣史已成為歷史研究的主流之一，人物傳記為其重要部份，相關的研究也頗有可述。但比較遺憾的是，清代大陸在臺灣任職的官員，似乎引不起專家學者關愛的眼神，這方面的論著除少數外，委實不夠精采。

就清代統治臺灣的二一二年間，文武職官，當是甚眾，其中學驗俱佳，卓有政績的亦所在多有，如任這些獻身臺灣的官員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是臺灣史研究的重大缺失。因此，吾人應費點心思，探討清代臺灣官員的事功，不僅表彰其造作治理的辛勞，也達到地方史實的填補作用。再者，儘管臺灣史料已積存一定的厚度，但對任期不長的通判或縣官，仍屬吉光片羽，少有著墨，要發而成文，實在困難，這也是地方官吏研究不受青睞的重要理由。

2006年4月下旬，筆者藉參加河南省舉辦的「第五屆河洛文化國際研討會」之便，順道走訪洛陽、鄭州，查詢有關閻忻的資料，可惜無功而返，只得就管見所及，找出這位清代河南省唯一任職噶瑪蘭廳通判的閻忻，並討論其在通判任內的治績。

二、閻忻調署噶瑪蘭廳通判

閻忻，河南新鄭縣（今鄭州市）城西之魯樓人，早年資料不足，事蹟不詳，不僅新鄭縣新舊縣志均無記載，甚至連河南大學出版，集錄多達二六四八人的《中州歷史人物辭典》也告闕如。

閻忻外號閻百篇，其曾孫閻濟臣曾加傳述，閻忻于南方某縣初任縣令，適逢縣學小考，微服出訪考生，皆認為縣令乃河南人，所謂「河



南秀才，差字布袋」，學問爾爾，命題不過「學而時習之」而已。後閻炘在連續二場考試中，均出題「學而時習之」，不准重複，考生深以為苦。考畢，某考生亦難之曰：「先生是否也作三篇，讓我等見識見識。」閻炘不假思索，揮筆一瀉千里，成數十篇，眾驚歎之，因取外號曰「閻百篇」。可見閻炘程度甚佳，榜列進士，的確真才實學。¹

閻炘是清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庚辰科三甲第十六名進士。曾任福建省羅源縣知縣、閩縣知縣，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正月二十四日調署噶瑪蘭廳通判，次年四月二十五日由徐廷掄接任，共在位一年又三個月。噶瑪蘭廳從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至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間，共歷通判四十八任，其中六個是兩任，實為四十二人，進士出身的只有八位，因此，閻炘擁有進士，誠屬難得。²

任職期間，有一事值得敘述。就是杭縣柳玉娘，甚具姿色，十六歲隨父幕游至噶瑪蘭。後父母雙亡，家貧無以為殮，賣身營葬，竟流入煙花。後染病久治不癒，老鴿相當厭惡，暗中棄置於土地廟中，依賴鄰里居民的殘羹剩飯，苟延生命。此時閻炘主政蘭邑，其幕客唐靜仙，為人豪傑，有一天，閒逛至土地祠，發現此事，十分憐憫，於是請醫生治療，數月後康復，膚色容貌較前更豔麗，老鴿得知，欲接回去。唐靜仙告訴通判，閻炘曰：「此奇緣也」，下令將此女許配給唐。及至婚禮，閻炘作〈奇緣吟〉七絕共十首，後僅流傳一首，云：「空閨寂寞歲華深，海樣穠春何處尋，山下麻蕪山上李，柳枝曲變白頭吟」。³既是善事，亦為佳話。

三、延續歷任通判對噶瑪蘭人的關照

1 這項資料是高雙印先生提供，謹此致謝。高先生軍職退後，往來兩岸從事文化交流，曾赴鄭州進行參訪並搜集文獻。

2 林玲玲，〈宜蘭縣文職機關之變革〉，上冊（宜蘭縣政府，民國八十六年十月），頁37-38。

3 蛻莽老人，〈大屯山房譚薈〉，《臺北文獻》，直字第一、二、三、四期合刊（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五十七年七月），頁183。



閻忻掌理蘭廳通判期間，最大的治績是關照噶瑪蘭人的生活，維護噶瑪蘭人的權益。這方面的資料，就筆者所知，文獻上唯一的來源是閻忻于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六月所立的「憲禁胥差需索社番戳記碑」。此碑長期埋在地下，無人知曉，後來宜蘭市城隍廟收回對面廟產土地，擬改建戲臺時才出土，從而見證此一失傳多年的重要史實，碑的尺寸高一五四公分，寬七七公分，厚十二公分。

從碑文內容看出閻忻是位憐憫子民，勇於任事的好通判。尤有進者，字裏行間也透露出先前通判相當體恤噶瑪蘭人的處境，因此，閻忻的措施就是延續歷任首長關照原住民的做法。茲根據碑文及相關文獻，略述自楊廷理以來對噶瑪蘭人的態度，作為討論閻忻原住民政策的歷史背景。

噶瑪蘭人樂天知命，缺乏生產經營的概念，沒有儲物備糧的做法。〈雙銜會奏稿〉曰：「查噶瑪蘭東、西勢社番，從前皆不諳耕作，是以埔地任聽漢人占墾。邇年以來，投誠歸化，與漢人相習日久，多有薙髮衣冠者，亦於本社地內耕種。惟番性憨愚，每年耕種，止穀一年食用，不知積蓄儲存，若不預為地步，恐荒埔分盡，地不加闢，將來社番生齒日繁，未免生計日縮。」⁴陳淑均亦曰：「蘭地三十六社，化番獨散處於近港左右，以漁海營生，負性愚魯，不知耕作。所有餘埔，漢人斗酒尺布即騙得，一紙牒字又不識漢字，所有牒約，即系漢人自書，但以指頭點墨為識，真偽究系莫辨。而所牒耕之輩，尤貪得無厭，雖立有牒約，至墾透後，應納租穀，居多糾纏不清。」⁵因此，歷代官長通判，相當同情噶瑪蘭人的遭遇，刻予保護。

楊廷理鑒於噶瑪蘭人耕地的嚴重性，特在大社周圍加留餘埔二里，小社周圍加留餘埔一里，立定邊界地址，不許漢人越界侵佔。並飭令東勢通事土目將社番自耕田園沿邊，栽插樹木，作為內界，只准社番自

4 汪志伊，〈雙銜會奏稿〉，載柯培元，《噶瑪蘭志略》（宜蘭縣政府，民國六十三年八月），頁141。

5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宜蘭縣文獻委員會，民國五十七年元月），頁421。



行耕種，不許漢人墾耕。其加留餘埔一里、二里外，沿邊亦栽插樹木，作為外界，以杜漢人日漸侵佔之弊。俾社番生計日裕，以示體恤。自烏石港口至東勢界址，約長三十餘里，寬一、二里不等，永為西勢番業，不許民人過溪越墾。希望東、西勢社番各安其業，得以免除爭奪，日久相安。⁶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通判翟淦將各社番埔，督飭三籍頭人，會同社丁、土目，逐一丈量甲數，繪圖造冊，先行詳報。「所有番社自耕田園，再為逐社清出界址，分別造具四至戈聲，永禁漢人侵佔。」⁷道光元年（一八二一），通判姚瑩督促西勢番總林興邦、社丁張金標、通事八寶籠，會同各社土目，戡定西勢加留沙埔，自烏石港起，至東勢濁水溪止，實存沙埔地約近五百甲，供為大小二十社之需，每丁得地二分一厘餘。定明邊界地址，分交各土目收掌，並繪造圖冊，其制乃告確定。⁸因此，噶瑪蘭廳設置之初，楊廷理、翟淦和姚瑩就立下政策，禁止漢人侵犯占地，無非要保留噶瑪蘭人的生存空間，護衛其家計生命。

道光三年（一八二三），呂志恒接掌通判，積極任事，條列議事上報，知府方傳綏覆核，其間對話，雖意見相左，但皆以噶瑪蘭人的權益為基點，深具意義。呂志恒希望改變收租方式，曰：「查東、西勢各社番，加留餘埔原為保卹番黎，今社番既曉自收，應如所請，給予社番向佃收租。每屆歲底，由各通土造冊報查，間有佃欠，並准呈官拘追，毋庸官為經理。」但方傳綏擔心社番受騙，仍循舊制而覆曰：「立法務期可久，而愚番尤須曲為籌慮。呂倖意以官設佃首，難免朘削，不如俾番自理。然番性愚拙易欺，縱不足，猶十得八九。若聽番自管，恐日久漢奸謀占，私買私賤，並埔業歸於無有，官亦無從清查。即如台、鳳等邑屯租，原係官為經理，後租收不足……。至今屯務大壞。蘭地餘埔，

6 汪志伊，〈雙銜會奏稿〉，頁141-142。

7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122。

8 姚瑩，〈東槎紀略〉（臺北，台銀文獻叢刊第七種，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頁79-80。



豈可再仍覆轍？」而且「難保非漢奸圖爭佃首不得，唆弄愚番，從中漁利。應請仍照原議，未可率改。」⁹從通判與知府的應答中，關懷原住民之情，表露無遺。

儘管先前劃設加留餘埔，保護噶瑪蘭人，但仍遭詐騙侵害，「重利盤削，克扣租糧，無事不圖噬番，無番不受朘削，徒有番租之名，而無受糧之實，甚至鳩占番地，分為己業，以致眾番日就窘迫，衣食不繼，殊屬可憫。」因此，通判全卜年于道光十三年（一八三三），特立「禁止漢人侵削社番保留地碑」，強調不得越界侵削社番自耕田段，以及欠抗番租，如有告發，即送官究辦。¹⁰立碑示禁，就是慎重其事的具體表現。

柯培元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署理通判後，以悲天憫人的胸襟寫下至性至情的〈熟番歌〉，說明蘭陽平原本來是憨厚質樸，平和正直的噶瑪蘭人的土地，但後來因漢人的強行佔領，使他們生計發生困難。宅心仁厚的柯培元同情噶瑪蘭人遭遇，深切瞭解個中道理，因而以勸誡的口吻說：「為民父母者慮其後！」亦即作父母官的縣太爺要以公正的態度來處置，否則基於因果關係，設想後代的子孫會有怎麼的結果呈現，換句話說，就是要善待噶瑪蘭人。¹¹

閻忻到任通判後，得知漢人侵害噶瑪蘭人的情況，又看到楊廷理、翟淦、呂志恒、全卜年、柯培元等歷任首長對噶瑪蘭人的遭遇甚表同情，在施政上多方給予維護，且對漢人再三告誡，禁止越界擾亂欺詐。油然興起憐憫之心，亟思為噶瑪蘭人的處境作出貢獻，況且這也是縣官應盡的職責。適在此時，噶瑪蘭人又受到重換戳記的傷害，所以閻忻就立碑革除流弊，替噶瑪蘭人討回公道。先是土目打那網施八等人陳情，每有新官到任，各社通事、土目之戳記必須繳換，每戳須納規費番銀

9 同上，頁48-49。

10 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鹿港，左羊出版社，民國七十八年六月），頁121-122。

11 徐惠隆，《走過蘭陽歲月》（臺北，常民文化公司，一九九八年九月），頁59-60。



五十元，以致「各辦公之番，竭棉莫措」（各通事土目，竭盡所能，還湊不出繳換規費）。因此閩圻決定煥發長行戳記，准予長行蓋用，不必按任繳換，以永除陋規。如頒給打那網施八的戳記，便有「噶瑪蘭分府給東勢婆羅辛仔宛社土目打那網施八長行戳記」等字樣。¹²

上述官長通判的施政表現，再三約束禁止漢人的優勢強悍，不得凌虐欺騙噶瑪蘭人，閩圻甚至接受其陳情，下令免除繳換戳記，以減輕負擔，這種體恤善待噶瑪蘭人的心態，實具保護少數民族的積極意義。

四、提高噶瑪蘭廳科舉文風

閩圻在通判任上，還做了一件對宜蘭的文教發展有重大貢獻的事，此雖非閩圻主動出擊，但如無他的積極配合，成效當大打折扣，就是貢生黃學海請議增加噶瑪蘭廳科舉名額的辦法，閩圻相當贊同，並向上呈奏，獲得認可，宜蘭學子因而受到惠澤。「淡蘭文風冠全台」的雅譽，與此當有密切關係。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三月，閩圻詳據黃學海等人的僉請文案，特加整理節略，云：「現在書院肄業者，二百六十餘名，其遠鄉教讀可以應試者，亦不下一百餘名，實在蘭童確有二百餘名。伏查設廳之始，因蘭童較少，故暫附淡考試。淡廳赴道府試童生百有餘名，而取進九名，澎童赴試僅五十名，取進四名。自淡抵郡，程祇七站，而澎則一羣可杭。至於蘭童路程倍於兩廳，而人數實多於兩署，誠得仰邀詳准自廳開考，以省赴淡兩月待試之費，則道考赴試童生必多矣。且查各廳縣學，取進名額，恒視糧賦為多寡，蘭境徵賦萬餘，澎湖固不能及，即淡廳亦可頡頏，糧既相若，路遠倍之，而童生實多於淡，可否仰懇，請援

12 楊欽年，《詩說噶瑪蘭》（宜蘭縣文化局，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頁137。



澎湖連府酌撥四名之例，寬其上進之階，以伸海澨士氣。至既開考，自應建立學校，其應首建學宮，蘭廳東門，舊有留存官所一地，海等僉願按畝捐資，修建文廟，兼置學田。倘蒙詳准奏設，又可免籌經費云云。」¹³這個奏文顯示如下意義：

之一，增加黃學海的史料：黃學海字匯東，號少軒，諱巨川，漳州龍溪人，生於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卒於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享年四十一歲。道光六年（一八二六）二十歲即入淡水廳學，補廩膳生，道光十七年赴省科舉中式拔貢生，為開蘭第一貢生，後加六品頂戴，候選直隸州州判。生前曾任仰山書院教授、《噶瑪蘭廳志》彙校，受聘淡水廳明志書院訓導有年。黃氏一族，家學淵源，科甲連登，擁有五貢七秀才之美稱。雖說黃學海著作甚豐，其侄曾彙集成冊，有丁承禧題耑並作序。¹⁴如確有此書，卻未能得見，誠感遺憾，至少靠閻忻呈轉，黃學海的這份陳情得以保存，對搜錄黃氏文集、黃家事蹟，甚至添補宜蘭的史料，深具價值。

之二，爭取科舉名額：清代噶瑪蘭廳早期的書院與科舉資料，幾乎都仰賴《噶瑪蘭廳志》的記載，其中黃學海的呈請，即提供重要資訊。如仰山書院的學員情形，就讀鄉間且可應試的人數，並以糧賦多寡，作為廳、縣學取進名額的依據，強調「蘭境徵賦萬餘，澎湖固不能及，即淡廳亦可頡頑，糧既相若，路遠倍之，而童生實多於淡。」因此，要求酌撥錄取名額，可「寬其上進之階，以伸海澨士氣。」此項議請經閻忻轉呈，獲上同意，於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由廳開考，逕送錄進三名。至二十六年科考，提學道熊一本加撥府學一名。二十七年以後，提學徐宗幹以路途較遠，文卷尚優，每科加撥府學二名為五名。三十年恩詔廣額案內，撥府三名，廣廳一名，則共進七名。¹⁵

13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310-311。

14 林萬榮，《宜蘭鄉賢列傳》（宜蘭縣政府民政局，民國六十五年五月），頁47。

15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313-314。



之三，建議就地開考：黃學海于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獲取貢生，以實際參加科考的經驗，認為噶瑪蘭廳學童廳考附設在淡水廳，而淡廳赴道、府考試者有百餘名，取進九名，澎湖廳赴試僅五十名，取進四名。而且自淡水到府郡，行程七站，而澎湖則一葦即可抵達。因此，「蘭童路程倍於兩廳，而人數實多於兩署，誠得仰邀詳准自廳開考，以省赴淡兩月待試之費，則道考赴試童生必多矣。」這個建議半年後就得到臺灣道姚瑩的首肯，同意照辦。《噶瑪蘭廳志》曰：「道光十九年己亥九月初二日，廳中奉臬道兼學政姚瑩批准，援照澎湖廳例，將府、縣兩考並歸蘭廳，就近錄取，逕送道考。」¹⁶噶瑪蘭廳衙就選址文昌宮右側做為考棚，從此蘭廳童生減少旅途勞累的痛苦，且可節省盤纏，應考人數遂有增多，誠屬人文日盛。其所以有此成果，溯本追源，黃學海應居首功，而閻炘的順水推波，亦可記上一筆。

之四，倡議興建文廟：宜蘭孔子廟，始建于同治四年（一八六五），為舉人黃纘緒、拔貢李逢時，仕紳林國翰等人發起興建，初建「泮池」、「黉門」，但初建造，即逢「唐山內亂」，物價飛漲而停工。直到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新科進士楊士芳及第返鄉，暨舉人李望洋、紳士黃鏘等召集宜蘭各界人士倡修大成殿，東西兩廡及崇聖祠，當時建廟董事多達一百二十位，皆為蘭邑官宦紳商等顯要之人。¹⁷然而最早提議興建孔廟的卻是黃學海，所持理由是「至既開考，自應建立學校，其應首建學宮。」地點就相中東門的「舊有留存官所一地」；尤有進者，黃學海等願「按畝捐資，修建文廟，兼置學田。」如此一來，政府則「可免籌經費」。黃學海慷慨捐獻，提振文教，擘畫籌運的用心，真令人感佩，當然閻炘的認同，也有功德。

16 同上，頁301。

17 宜蘭縣政府民政局文獻課，《宜蘭縣寺廟專輯》（宜蘭縣政府，民國六十八年十月），頁61。



五、填補噶瑪蘭廳通判史實

近年來，宜蘭史研究深受重視，宜蘭史實逐漸被揭露，但闕漏不足之處，仍然很多，尤其是清代，距今較遠，更是嚴重。雖然號稱宜蘭史乘雙璧的《噶瑪蘭志略》和《噶瑪蘭廳志》已有所記載，但篇幅有限，總難周全，必須借助其他資料的充填。就此而言，閻忻的碑文發揮效益，填補宜蘭歷史的空窗，功不可沒。茲舉通判部分，試加說明。

（一）增加通判的史料內容

《噶瑪蘭志略》付梓于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噶瑪蘭廳志》則于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刊行，二書均列出前此噶瑪蘭廳通判的姓名、籍貫與到任日期，廳志雖有五位通判的敘述，卻也非常簡略，有的甚至只有二行文字而已。因此，想從這二本志書中得到歷任通判的生平事蹟，幾為不可能，所幸閻忻的碑文曾提到前此數任通判對戳記的態度，而留下可貴的史料。

其一，翟淦：碑文曰：「前憲加意體恤，舉設總理、社丁為之提撕警覺，仍令各社自擇誠實妥番充當通事、土目，給領諭戳，管理社務，約束番丁，毋庸官為飭充以杜另驗換戳之弊，當經通詳在案。」此「前憲」即翟淦，這段文字顯示翟淦對噶瑪蘭人的管理辦法。

其二，洪煌：碑文曰：「及越至道光七年間，洪前廳到蘭蒞治，謂各通土所領戳記行用已久，字畫糊混。著即繳銷換給，每戳派出番銀五十元以供費用，等因時各遵照繳送，意以此換必可永遠行用，誰知以後陳陳相因，積而成例，每遇新官到任即應換給戳記繳費銀，致各辦公之番，竭棉莫措。」意即通判洪煌鑒於平埔社番使用的戳記，因時間長久而字跡模糊，應進行更換，然須繳納五十元的費用，這或許是一時的需要，實則開後來的惡例，每次通判上任，就得繳費更換，造成噶瑪蘭人沉重負荷，致使洪煌無意中背負黑鍋。



其三，李若琳：碑文曰：「嗣幸于道光十六年間，李前廳接篆署理，洞悉番眾，究因不堪供費戳費，當將所換諭戳當堂發交承領，諭免繳費銀，朗等仰沐鴻仁，雖各互相稱頌，然係邀一時之倖，終不敢異後來之不再。」李若琳通判到任後，明察原委，瞭解狀況後，廢除戳記規費，減輕噶瑪蘭人的負擔。噶瑪蘭人在感佩之餘，也憂心以後是否會重演繳費。

其四，閻炘：碑文曰：「吊銷前任舊戳，會給該通土長行戳記，免其按任繳換以昭信守，並將歷任換戳原奏註銷在案，茲據僉呈前情，除據情詳請本府憲批示立案，革除換戳使費名色，以垂久遠外合行出示曉諭。」閻炘通判深怕難保日後不再收戳費，不僅依照李若琳通判免繳戳費，更將新發給的戳記加上「長行」字樣，以示永久使用，避免日後橫生困擾，進而為表慎重，特立碑曉諭周知。

就此說來，這幾位通判千里迢迢，遠到噶瑪蘭廳任官，如終其一生默默無聞，不免遺憾，至少他們的此項治績因這個碑文得以流傳下來。非但如此，閻炘通過此碑，將戳記的來龍去脈，曲折過程交代得非常清楚；由此造成官府、胥吏、社番間的複雜關係，也做很好的陳述，此段重要的史實，廳志缺乏詳細說明，其他史料也難得一見，唯賴此碑得以真相大白。閻炘立碑之功，不僅當時噶瑪蘭人受惠良深，保存真相更讓治史者十分感念。

（二）稟報前任通判任內虧空

清代官吏向來流弊很多，官吏的任用以利益愛憎為基點，不論才幹之長短，無視品誼之高下，而偏重禮節之厚薄。於是乎，大多數州縣官「專意逢迎，投其所好以邀上歡。遇有美缺，竭帑鑽營，希圖保題。倘上司經過多方曲探上意，不惜鉅資。」貪墨成風，吏治遂不可聞問，崇奢賽糜，州縣的虧空將難有底止。¹⁸

18 韋慶遠，〈論清代官場的陋規〉，《明清史新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頁272。



這種虧空的出現跟清代的薄俸有關，官員除了生活費、辦公費外，還須自付幕友的束修及家丁的工食，薪水自然不敷使用，而「自古官有餘俸而後可以講吏治」，為了現實問題的補救，各官得有養廉銀。但養廉銀畢竟有限，且常被不合理的攤捐，名目多到不成事體。一但承受不了攤捐的苛派，日積月累，虧欠自然產生，弊端由是滋長。不肖官吏亦藉此中飽私囊。¹⁹再者，來自大陸他鄉的地方官，當然不會認為臺灣是自己「長留埋骨之地」，而抱著五日京兆的心態，等到高升遷調，部分貪官也就胡作非為，榨取民膏民脂，充實日後衣錦還鄉的老闆，正是應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官場諺語。²⁰

清代宜蘭廳縣首長曾有數件貪瀆案，受到查辦，嚴重的還有遭抄家革職。其中一件是閻忻稟報，提供資料，方能治罪。閩浙總督鄧廷楨奏曰：「准補澎湖通判李若琳，先因伊子李春禧被控奸賊延不送案，經臣等奏請暫行革職，所有該參員署噶瑪蘭通判任內經手倉庫銀穀，當經檄飭該管道府督飭接屬之員，立速盤查據實供報，如有短少，揭參究辦。茲據接署通判閻忻稟報，李若琳任內，除交抵外，尚短番折銀一萬二千九百餘兩，倉穀一千四十餘石，屢催延不完交，由藩臬兩司轉據該管道詳揭前來，臣等查廳縣交代，無論正雜捐賠銀谷，均應依限交清，難容絲粒短缺。今李若琳交噶瑪蘭廳任內番折銀一萬二千九百餘兩，倉穀一千四十餘石，顯有虧挪情弊。且該參員前在建陽縣任內，尚短捐雜等款九百三十餘兩，番銀七圓零，盤折穀價銀七百一十一兩零；漳浦縣任內，捐款銀五百三十四兩零，番銀一百四十四圓零，銅錢一十五千四百餘文。自應一併嚴參進辦相應，請旨將已革通判李若琳即行拏問審訊，以免稽延。」²¹這個參奏呈現如下資訊：

19 劉妮玲，《清代臺灣民變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民國七十二年九月），頁43-46。

20 戴國輝，〈晚清時期臺灣的社會經濟〉，《臺灣史研究》（臺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七十四年九月），頁35。

21 〈戶部「為內閣抄出閩浙總督鄧廷楨等奏」移會〉，載《明清史料》，戊編第十本（北京，中華書店，一九八七年三月），頁984-985。



其一，李若琳離任噶瑪蘭廳通判後，准補澎湖廳通判，其子遭控奸賊，已被奏請暫行革職。

其二，李若琳離任噶瑪蘭廳通判時，短缺番銀與倉穀，為數甚大，屢催延不完交，顯有虧挪情弊。

其三，李若琳先前在建陽縣、漳浦縣任內，已有短缺捐雜等款項銀、番銀、價等，一併受到追辦。

其四，奉旨下來，對李若琳的虧缺嚴行究辦，著即挈回，其家產及寓所資財均查封備抵。

李若琳在建陽縣和漳浦縣的虧空款項均為數百兩，但在職噶瑪蘭廳僅半年多，就短缺萬餘兩，金額之多，令人難以置信。掀露這個弊案資料的就是閻炘，他為何要告發稟報，文獻無徵，吾人可試作推測：之一，閻炘行事公正廉潔，體恤百姓，斥責貪官污吏，看不慣李若琳的劣跡，特予檢舉。之二，閩浙總督鄧廷楨得知李若琳縱容兒子遭到控訴，產生疑竇，下令閻炘詳細調查上報。之三，兩人是前後任通判，閻炘就職後，發現李若琳虧空嚴重，無法解決，害怕問題掀開，受到牽連，只得稟報實情。總之，不論是何理由，李若琳的定罪開革，閻炘發揮一定的作用，對自己而言，提高聲望，獲得首長賞識，贏取人民感念；對吏治而言，打擊犯罪，糾舉不法，改善政風，為宜蘭歷史留下珍貴的一頁，但吊詭的是，他後來調任臺灣縣知縣，卻也因案而遭治罪。

六、見證噶瑪蘭廳衙的收取規費

清代吏治的重大缺失之一就是陋規。瞿同祖認為這種陋規的慣例是「不正常的」、「賤鄙的」，正如「陋規」一詞本身所表示的；但它仍被確立與承認，並被廣泛接受的事實，因而也在法律的默許之內。問題是何以會有陋規？照實說來，幾乎各階層的官吏都有些積習，且深陷其



中。就通判教官而言，他們為求升遷高就，須向當道獻贈財物，同時，要照顧幕友，權給費用，凡此非得一筆龐大款項，無法成事，其有限的薪水怎能應付得來，答案就是收取規費的「陋規」。甚至許多官員認為陋規不能革除，因為它是滿足各種行政費用的唯一途徑。²²

廳、縣是清代國家政制的基層政權，其首長乃所謂的親民之官，負責直接向人民徵收賦稅和進行第一級審判的部門，諸凡一切錢糧刑名政務都是從州縣做起的。因此，上級官府本身所受納或送饋的陋規，多半都是利用權勢向州縣索取，州縣的陋規則取給于百姓，攤派于小民。簡言之，就是官、吏、役人等直接向廣大人民勒索，造成庶民百姓為陋規最後承擔者和最大的受害者，民間困苦，多由於此。²³

這種地方性的陋規，種類繁多，內容細瑣，而且各地巧立名目，不盡相同。就此而言，閻炘所撰的碑文，涉及到陋規，可有如下解讀：

其一，見證噶瑪蘭人的被迫害：嘉慶初年，漢人大舉入墾宜蘭，以強勢的姿態，惡質的手段，欺壓噶瑪蘭人，迫使他們漢化或遷徙花蓮，但官吏的陋規收費，較為論者忽略，閻炘的這個碑和咸豐六年（一八五六）通判楊承澤所立的「嚴禁差胥需索社番貼費碑」，就是以陋規事件補強噶瑪蘭人暗抱哀痛的歷史事實。《噶瑪蘭志略》曰：「噶瑪蘭為流番散處，故無土官。入版圖後，每社置一通事土目應官役，官給以印戳，一社聽其約束。終歲力作，女則紡績，其所織布雖粗而堅，有取嗶吱拆為縷織作文彩者，名『卓戈紋』，尤貴重。富者蓄積洋銀數萬至十餘萬不等，然苦於漢人之凌虐與胥役之騷擾，即如新官至，管番社之書吏請出差傳諭，差至其家，餉以酒肉，贈以盤費，吊取舊戳，別給新戳，而消舊戳則有費，領新戳又有費，點卯有費，候卯又有費。至社中鬥毆爭訟及與漢人墾佔詞訟，則更飽胥役之手。總之，欺其愚

22 瞿同祖著，范忠信、晏鋒譯，《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六月），頁46-49。

23 韋慶遠，〈論清代官場的陋規〉，頁266-267。



也。」²⁴

其二，增補宜蘭的陋規史料：宜蘭偏在邊陲，形勢封閉，固然有利史料的保存，但為數仍屬有限，無從獲悉宜蘭史的實情，尤其是地方上相當普遍的陋規事件。換言之，如沒有這個部分的資料，宜蘭歷史的重建將更為殘缺不全。閻炘的碑文不僅將社番換發戳記的過程與收費情形說得非常清楚，甚至提及「派出番銀五十元以供費用」，連明確的金額都有記載，不僅增加宜蘭的陋規資料，且備為族群關係、社會生活與經濟物價的參考取材，達到宜蘭史的添補效益，更發揮以碑補史、證史的功能。閻炘廢除陋規，不僅造福噶瑪蘭人，同時也為自己留下美好的紀錄。

七、臺灣縣知縣任上

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四月閻炘離任，接掌臺灣縣知縣，任內頗有建樹，獲得獎勵，又曾豎立「錮婢積習示禁碑」、「嚴禁惡丐強乞吵擾勒示碑」、「防火章程碑」三座碑，關心社會民情，垂念庶民生活，後來，卻不幸遭革職治罪。茲分述其立功與革職。

（一）平亂獲賞

道光年間，臺灣人心浮動好亂，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九月，嘉義匪徒滋事，攻撲文武官兵。臺灣道姚瑩派兵馳往剿辦，以靖地方，並令部屬帶領義勇，隨營辦事。且提交銀兩支應備戰。至於後方，因大兵既出，城中防守宜益加嚴，則督同府廳暨臺灣縣知縣閻炘及弁兵、義勇留守郡城，分守各倉庫、監獄及諸要隘。後賊匪聞風逃散，官兵分頭嚴捕，知縣閻炘拏獲匪夥吳添、陳登牛等。當嘉義多事之秋，南路賊匪亦

24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125-126。



豎旗回應，十月初，鳳山縣有匪徒多人滋事傷民，姚瑩則委知縣閻忻督帶義首、壯勇，會同守備李思升，馳往夾擊。配合其他文武官員，督率營員、屯弁、義首人等，拏獲股首陳冲等近百人，擊斃格殺五十餘人，終使賊匪逃散，亂事平定。²⁵因此，南北兩路賊匪終致潰敗，地方恢復安靜，臺灣道達洪阿和姚瑩的指揮調度，實居首功，文武官兵的奮勇追殺，亦足堪稱贊，其中閻忻的「留守郡城」與「馳往夾擊」，「拏獲股首」，亦屢有建功。事後，姚瑩於次年二月十六日上奏「遵旨籌議覆奏」，六月初九日奉到朱批，有曰：「閻忻名旁，奉朱圈」，對閻忻的表現，可圈可點，頗表滿意。²⁶

由於臺灣地理位置優越，為航運必經道路，向來是列強覬覦侵犯的目標。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三月間，臺灣南部沿海各地陸續發現英國船隻窺伺游奕，經守軍礮擊，互相開火，曾擊沉外船多隻，溺斃甚眾，生擒奸匪多名。知縣閻忻拏獲「通夷之逃徒」蕭石一名。因此，外患見無隙可乘，於是避走離去，姚瑩遂與「臺灣府知府熊一本、台防同知全卜年、臺灣縣知縣閻忻暨委員人等，提訊各犯。」進而為防範奸民被外敵勾誘，謀通夷船，除全錄所供招的實情外，並督促加意戒備。²⁷為表揚爾時攘禦外侮進逼，擊破南北兩路賊匪的勞績，姚瑩于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四月，開列列表，奏請獎勵，其中論及臺灣縣知縣閻忻時，曰：「該員當鳳山、嘉義二縣匪徒滋事，臺灣界在其中，遣派丁役、雇募鄉勇，防堵兩路，均無貽誤。復帶領義勇會營，往南路擊賊潰散，拏獲南路凌遲股首陳細、通夷偽軍師張從及匪夥軍犯許士、林發、林照、藍連，北路逆匪吳添、曾賽、陳豬批、吳戇、陳登牛、楊八等犯。可否以同知直隸州優先升用，先換頂戴？」八月奉到朱批，「臺

25 姚瑩，〈出剿嘉義逆匪部屬郡城奏〉、〈南路匪徒響應遣員擊破奏〉、〈南北路逆匪首從就擒地方平定奏〉，《東溟奏稿》（臺北，台銀文獻叢刊第四九種，民國四十八年六月），頁43-55。

26 姚瑩，〈遵旨籌議覆奏〉，《東溟奏稿》，頁89。

27 姚瑩，〈擊破通夷匪船拏獲奸民逆夷大幫潛遁奏〉，《東溟奏稿》，頁104-107。



灣縣知縣閻炘著以直隸州儘先升用，先換頂戴。」²⁸同年五月，姚瑩又另稟奏請論功行賞，提到閻炘的卓績，「先後拏獲通夷漢奸逆罪張從、賴媽來、蕭石，使夷無內應，破其奸計。黃開基密令雇募漁船，誘破夷舟，辦理妥洽，又生擒白夷一名，黑夷四名，取獲杉板船一隻，銅礮一門，均屬尤為出力。黃開基、閻炘二員，已於南北逆罪案內奏請以同知直隸州儘先升用，可否同曹謹、全卜年均賞戴花翎？」十月間，內閣奉上諭，「淡水同知曹謹，台防同知全卜年、准升同知直隸州之臺灣縣知縣閻炘、彰化縣知縣黃開基，均著賞戴花翎。」²⁹經姚瑩提報，皇上賜准，真是莫大的光彩。

清代臺灣無業遊民，性情剽悍，且與匪徒暗中勾結，人少淪為盜賊，人多則圖謀不軌，終歲皆然，秋冬尤甚。因此，儘管姚瑩前此已救平亂事，但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十月民變又起，即號稱「總元帥」的洪協糾集三、四百人豎旗肇事，攻擊臺灣縣木柵地方，殺害兵丁，奪取軍器，到處派飯勒銀，誑收民錢，後聚眾約有二千餘人。臺灣道初聞警報，隨即應變處理，一方面委由准升台防同知閻炘、代理台防同知即用知縣鄧元資稽查街道、倉庫、監獄，以昭慎重。再方面則調部屬帶兵五百名、屯番五百名，趕往圍剿，驅前奮發，傷賊無數，餘眾潰散，逮捕洪協歸案，地方又恢復平靜。³⁰就此案看來，閻炘雖非領軍出征，但清查街道，安撫民心，固守後防，亦功不可沒。復次，此時閻炘仍是臺灣縣知縣，然而已稱呼朝廷賞賜的職稱，以增加其榮耀。

（二）革職拿罪

官場起落，宦海浮沉，說是命亦無不可。運來時加官晉爵，得享榮華富貴；運去時則身敗名裂，甚至抄家滅族。數建功績的閻炘受到臺灣道姚瑩的倚重敘獎，朝廷也恩賜賞戴，何等風光，再配合進士的正途身

28 姚瑩，〈查明南北兩路逆案出力人員奏〉，《東溟奏稿》，頁111-121。

29 姚瑩，〈查明大安破舟擒夷出力人員奏〉，《東溟奏稿》，頁138-142。

30 熊一本，〈臺灣鎮道會稟剿辦台匪洪協等情形由〉，載《台案彙錄》，甲集第二冊（臺北，台銀文獻叢刊第三種，民國四十八年一月），頁144-146。



份，自是前景無限，但不及周年，于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四月，即解任治罪，真是命運無常。

閻忻的革職是郭洸侯事件造成的。臺灣縣數額徵收倉穀，先是民間運送困難，於乾隆年間議定章程，每十石為一車，折收洋銀二十二元，曾詳明道府在案。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鄉民因穀賤銀貴，又值夷人滋事，捐資募勇，增加費用，以致具呈求減數額。經知縣閻忻稟知臺灣道姚瑩，飭令減二元，以紓民力，惟嗣後不復援以為例，仍依舊制徵收。次年，閻忻循照二十二元之數折收，他眾皆有完納，惟郭洸侯等人仍欲減去二元，雖有書吏開導，仍堅不多繳。並與鄉民數百人商欠交穀，以挾制求減，一方面派人具名赴鎮道衙門申訴，再方面湊備穀石送繳，運至倉外堆收。縣吏以他眾均收洋銀，不便郭洸侯等獨收穀石，後雖同意交穀，但需找貼洋銀，納足二十二元之數。並欲補拏郭洸侯等到案，然郭洸侯恃有鄉民庇護，抗拒不出，及至閻忻告病卸事，王德潤奉委代理，仍欲照閻忻原議折收，民情激憤，書吏不滿，形勢更加緊張混亂。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十月間，臺灣道總兵昌伊蘇聞知報告，調兵剿捕，並募勇聽候差遣。郭洸侯即行逃出，潛船偷渡，進京控訴，攜帶前在臺灣鎮衙門所遞呈的訴狀，向御史陳述，轉呈稟情。結果接奉諭旨，郭洸侯聚眾違抗官府，交部嚴訊懲罰，但所供內容，據以進查，臺灣縣知縣閻忻則遭論處，曰：「折收糧穀，訊系循照歷任舊規，尚非格外浮勒，惟東鄉花戶於已減糧價不肯仍復舊規，該縣並不妥為籌議，迨各花戶運穀上倉，又不即時核實量收，以致相持日久，未能了結，實屬辦理不善，應請旨交部論處，飭令回省聽候部議。」最後受到革職處分。審訊期間，閻忻並未苛責郭洸侯，認為他實無謀逆意圖。³¹由此看來，閻忻堪稱厚道，不失為好的縣官，革職治罪似乎重了些，真是宿命。

31 穆彰阿，〈大學士穆彰阿等覆奏審擬郭洸侯一案供情摺〉，載《台案彙錄》，甲集第二冊，頁148-158。



宿命之說，頗堪玩味，可能是郭洸侯遠赴京城告發，千里迢迢強化問題的嚴重性，使得判刑加重。再者，當鄉民抗爭時，「官兵恐致激變，旋即撤回。後閻炘告病卸事，王德潤奉委代理，仍然照閻炘覆議折收。」這段話表示，官兵準備撤回二元之際，適逢閻炘告假，代理的王德潤，不知變通，事件更形擴大，如閻炘仍在任上，依其行事風格與體恤心態，情況應會有所改善。因此，閻炘的入罪，說來不無冤枉。

八、結語

閻炘為官臺灣約共六年，可分噶瑪蘭廳通判與臺灣縣知縣兩個階段，前者任期一年三個月，是本文的重點所在，後者時間較長，但非屬討論範圍，然為求其在台期間的完整性，對治理臺灣縣的事蹟也略作敘述。

回顧閻炘這六年的施政表現，真是盡忠職守，恩澤百姓，以噶瑪蘭廳來說，刻意立碑，禁收規費，以照顧噶瑪蘭人的生計，保護弱勢族群的權益；同時，體認宜蘭僻在邊陲，讀書風氣卻很普遍，因而接受增加科舉名額，就地開設考場等的陳請，嘉惠莘莘學子，免受顛波跋涉之苦，其附加效益，就是添增清代宜蘭的史料與史實。就臺灣縣而言，協助臺灣道，或防衛郡城，或追擊賊犯，均達成任務，確保地方安寧。此外，看到人民稅捐過重，先是向上級請求減輕，以紓民力，也是一件善舉；惟後又恢復舊制實收，引起民怨，以致郭洸侯赴京舉發，構成罪狀，雖不免命運作祟，也徒呼奈何。

要之，規費問題應是閻炘揮不去的噩夢，如影隨形；順境時，裁掉新換戳記的五十元規費，蘊含保護原住民的積極意義；逆勢時，卻受到二元規費的連累，以致革職審問，斷送大好遠景，可謂成也規費，敗也規費。造化弄人，莫此為甚。



附錄

閻所任職噶瑪蘭廳通判時所立，也是本文的重要參考資料。另外三座碑乃其主政臺灣縣時豎建的，分別為「錮婢積習示禁碑記」、「嚴禁惡丐強乞吵擾勒示碑記」與「防火章程碑記」，惟碑文內容無關宜蘭事務，不在探討之列，故缺而不錄。

憲禁胥差需索社番戳記碑

調署福建臺灣噶瑪蘭管理民番糧捕海防分府、加五級、紀錄十二次、大功六次閻 為 曉諭革除流弊事，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初二日，據東西勢各社番通事高令擔武朗兩爻芥埕土目打那網施八龜劉斯吉等僉呈詞，稱：各社番黎規化之初，性素憨而事務不諳，習俗殊而語言不通。荷蒙

前憲加意體恤，舉設總理、社丁為之提撕警覺，仍令各社自擇誠實妥番充當通事、土目，給領諭戳，管理社務，約束番丁，毋庸官為飭充以杜另驗換戳之弊，當經通詳在案。並即遵行無異。以是而番之承充首責者，視免花費之累，皆樂向前奉公矣。及越至道光七年間，洪前廳到蘭蒞治，謂各通土所領戳記行用已久，字畫糊混。著即繳銷換給，每戳派出番銀五十元以供費用，等因時各遵照繳送，意以此換必可永遠行用，誰知以後陳陳相因，積而成例，每遇新官到任即應換給戳記繳費銀，致各辦公之番，竭棉莫措。嗣幸于道光十六年間，李前廳接篆署理，洞悉番眾，究因不堪供費戳費，蒙將所換諭戳當堂發交承領，諭免繳費銀，朗等仰沐鴻仁，雖各互相稱頌，然係邀一時之悻，終不敢異後來之不再。飭繳茲逢仁憲奉調來□□□，既見精奇，操守尤為廉潔，且也目清訟案，嚴辦盜賊，善民隨即事懲。愚番則格外優恤，其或一切宜務無不斟酌整飭，相度施行。□等於此又喜德政之維新。然不敢謂戳費又免備款也，乃幸于齊集點卯之期，蒙諭換戳費銀仍免繳送，飭將原戳繳銷，



令給長行字樣，蒙註銷免費日之語，未有明證，竊恐無以垂久而杜異合情，相率叩伏父母孔邇息將吊換戳記原案，先行註銷。□□□情牒詳上憲批示立案勒碑為記，俾換戳費之事，自茲革除，而各辦社務之番奕世銜感切叩等情。據此，查蘭屬東、西勢共有歸化熟番三十六社，每社設有通事、土目為之管理社務，約束番丁，由廳給發通土戳記，以為代番收租截串公事之用。其□給戳記本有戳式存案，設有假控形勢，盡可調閱原卷查核，自可無須調換新戳，轉滋弊竇。本分府到任訪悉情形，業經□差吊銷前任舊戳，換給該通土長行戳記，免其按任繳換，以昭信守。並將歷任換戳原奏註銷在案，茲據僉呈前情，除據情詳情，本府憲批示立案，革除換戳使費名色，以垂久遠外合行出示曉諭。為禁仰合屬東、西勢各社番通土暨各番黎知悉，自今以後，爾等所領戳記准予長行蓋用。業經本分府立案，無須繳換。倘有漢奸通同不肖書役藉以新任換戳名目，勒收規費，許爾等指名稟究，慎勿被人仍前撞騙，自取苦累。

各 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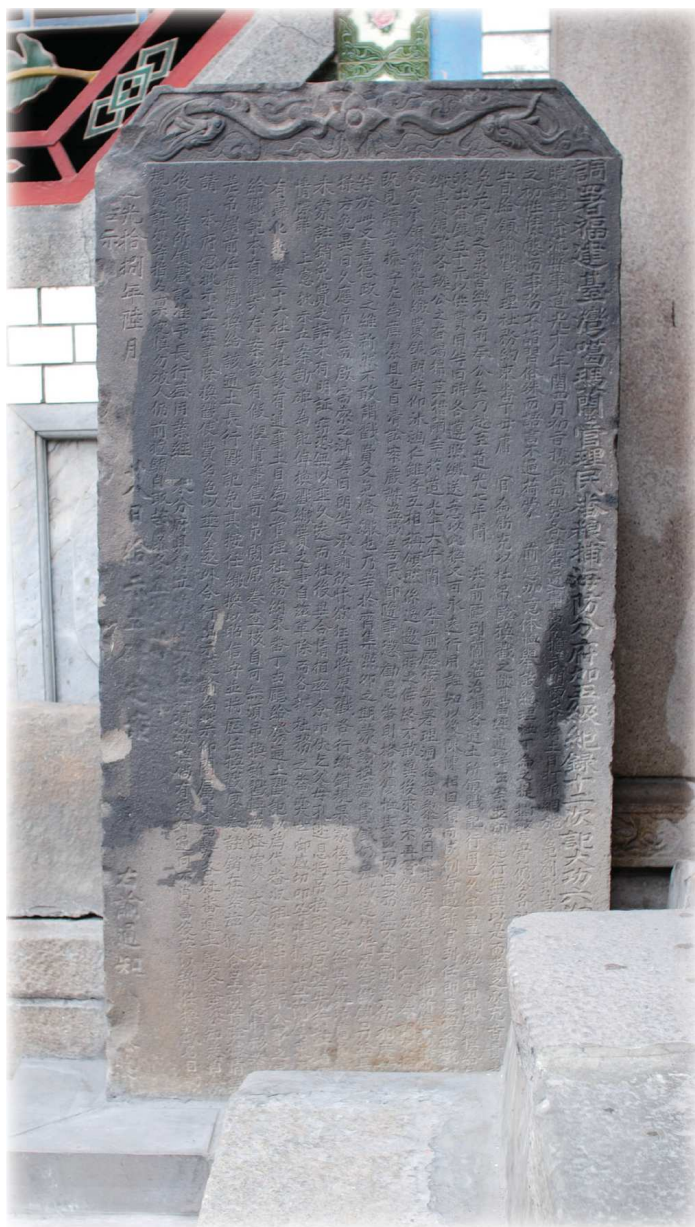
道光十八年陸月二十八日 給示立碑定案

告示 右諭通知

（資料來源：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頁124。）



河南籍噶瑪蘭廳通判閻忻事略



憲禁胥差需索社番戳記碑（陳進傳攝影）